

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卢 馨,李慧敏,陈烁辉

(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结合舞弊动因理论和高层阶梯理论,选取2001—2013年间因财务舞弊而受到证监会处罚的108家上市公司及108家对比企业作为样本,对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的关系、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与舞弊行为严重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小、男性比例高、平均学历以及平均任期短的上市公司发生舞弊的可能性更大,同时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越低,则越容易发生严重的舞弊行为。最后,根据分析结果从识别舞弊行为、优化高管团队和提高公司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财务舞弊;舞弊动因;管理层舞弊;企业战略;公司财务战略;财务舞弊行为;会计舞弊;战略成本管理;企业竞争优势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5)06-0058-11

一、引言

在公司规模扩大、资本市场日趋成熟的环境下,财务舞弊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而高管人员作为财务舞弊行为的关键决策主体,是被关注的重点之一。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3年,我国证监会公告的因财务舞弊受处罚的139家上市公司中,有高达1290多名的高管受到处罚,平均每家公司受处罚的高管人数约为10名。由此可见,我国管理层舞弊的现象比较严重。

相关学者们对高管人员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大多数学者只集中于研究高管团队中的某个角色,很少有学者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整个高管团队,并且大多数学者只集中于研究高管背景特征中的规模特征,没有全面地研究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Hambrick和Mason提出的高层阶梯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间和职业经验等,能反映高管的价值观、对风险的态度等心理特征,从而会对高层管理团队的决策过程和团队组织过程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1]。根据财务舞弊的动因理论,个人因素是财务舞弊行为的关键动因,而高管背景特征作为体现其心理特征的标志,可以通过影响舞弊动因中的道德和动机因子、机会和暴露因子等来进一步影响舞弊行为。基于此,本文以“高层阶梯理论”和“舞弊动因理论”为基础,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

我们选用2001—2013年,因财务舞弊行为而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及其对比企业作为样

[收稿日期]2014-10-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171097);暨南大学企业发展研究所重大项目(2014ZD001)

[作者简介]卢馨(1963—),女,台湾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公司财务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战略成本管理、企业跨国经营等研究;李慧敏(1990—),女,河南焦作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司财务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战略成本管理研究;陈烁辉(1987—),男,广东潮州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硕士研究生,从事公司财务战略与企业竞争优势、战略成本管理研究。

本,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小、男性比例高、平均学历以及平均任期短的上市公司发生舞弊的可能性更大,同时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越低,则越容易发生严重的舞弊行为。这一结果表明,高管的背景特征影响着财务舞弊行为。基于上述发现,我们结合相关理论和我国的制度背景进行了解释。

本文的贡献在于两方面:首先,本文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对财务舞弊行为进行研究,扩展了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视野,是对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为防治财务舞弊和改善公司治理提供参考。其次,本文以财务数据造假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判断舞弊行为严重性的标准,建立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增加了分析结果的参考意义,深化了现有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财务舞弊行为与高管人员密切相关,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较多的研究。早在 1986 年 Albrecht 和 Romney 就发现许多有关财务舞弊的预警指标都和管理人员的个人素质密切相关^[2]。Kinney 和 McDaniel 也发现管理当局不诚实、人格异常等是会计舞弊的信号^[3]。Cottrell 和 Albrecht 的研究也表明,高级管理人员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变化是会计舞弊的征兆^[4]。2002 年美国政府颁布了《SOX 法案》,强调了高管人员对财务舞弊的责任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我国的陈庆杰等通过对舞弊冰山理论的分析,更是将高管因素作为财务报告舞弊的首要因素^[5]。

相关学者们对高管人员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治理视角分别展开的,而股权结构、内部组成、规模等是研究的主要内容。如 Klein 发现外部董事比例低的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舞弊^[6],韦琳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7]。我国的陈国欣等发现独立董事规模是识别财务舞弊的主要指标之一^[8]。而杨清香等通过研究董事会特征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呈“U”型关系,董事会持股比例与财务舞弊呈正相关关系^[9]。吴革等通过对财务舞弊特征指标的研究,发现监事会规模会对财务舞弊行为产生影响^[10]。另外,岳殿民等通过对会计舞弊主体的统计,发现除了董事会成员外,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是受处罚最多的人群^[11]。而陈庆杰等发现总经理的受教育程度与会计信息虚假程度呈负相关关系^[5]。

Hambrick 和 Mason 指出,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学历、任期、职业经验等,这些特征对价值观、认知水平和风险偏好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管理者的决策行为,而价值观、认知水平和风险偏好不容易进行识别,因此选用背景特征来预测行为具有可获得以及相对稳定的特点^[1]。Hambrick 和 Mason 的高阶理论提出之后,学术界进行了大量关于高管背景特征与战略选择和公司绩效关系的研究。与此同时,学者们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了高管的行为方面,对高管背景特征与决策行为和过程、投资行为、盈余操纵行为和盈余质量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部分学者对高管的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会计信息质量、财务重述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例如李若山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高管人员的学历与舞弊可能性存在正相关关系^[12]。杨薇等的研究发现 CEO 的任职时间越长,公司的治理效率越低,越有可能产生财务舞弊^[13]。杨星的研究则发现,男性高管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负相关^[14]。另外,王霞等对 CFO 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研究发现,CFO 是女性的企业其会计信息质量较高^[15]。而何威风等的研究发现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相关^[16]。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相关学者们对高管人员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多,且大多学者只集中于研究高管团队中的某个角色,很少有学者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整个高管团队,并且大多学者只集中于研究高管背景特征中的规模特征,没有全面地研究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从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引入高管团队的年龄、性别、学历和任期等变量,对财务舞弊行为进行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图 1 揭示的是高层阶梯理论和舞弊动因理论是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财务舞弊行为的。组织行为学相

关理论揭示了组织中的个人心理因素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高层阶梯理论提出以行为人的背景特征作为其心理特征的反映,对行为人的背景特征与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根据舞弊动因理论,个人因素是财务舞弊行为的关键动因,而高管的背景特征作为体现其心理特征的标志,通过影响其行为的方式来影响财务舞弊。此外,高管背景特征还可以通过影响公司绩效、投资效率、财务状况、内部控制效果等不同方面来影响舞弊动因中的需要、机会、暴露等因子,从而影响舞弊行为。总而言之,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反映出了心理因素,指引了行为的发生,引发了公司绩效和战略等的改变,进而可能导致财务舞弊的发生。因此,本文结合高层阶梯理论和舞弊动因理论从高管团队的年龄、性别、学历和任期四个方面来研究高管背景特征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

(一) 高管年龄

高管的年龄代表了经验积累的情况以及风险偏好,经验的积累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多的依据,风险偏好也直接影响了行为的倾向。Hambrick 和 Mason 提出年龄大的高管人员更加厌恶风险,注重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年轻的高管人员则更有可能产生冒险的行为^[1]。年龄的不同会对行为的决策产生影响,年长的高管人员会更多地依赖经验,考虑更多的因素,预计可能出现的后果,对风险持厌恶和不自信的态度,根据舞弊动因理论中的舞弊风险因子理论,年长者个别风险因子中的舞弊动机也会降低,因而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可能性就低。而年轻的高管人员则会更多地依赖自身的认知,对风险持偏好和自信的态度,因此选择冒险行为的可能性较高,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可能性也较高。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 高管团队年龄与财务舞弊行为负相关。

H1b: 高管团队年龄与财务舞弊行为的严重性负相关。

(二) 高管性别

男女高管在管理风格、风险偏好、价值取向上存在不同,而且由于外部环境对男女高管行为的反馈也不同,男女高管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同的行为倾向。一般来讲,男性高管的风险偏好更大,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从而导致决策错误^[17],更有可能在财务上铤而走险,进行财务舞弊行为。另外,高管的性别会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参与能够提升企业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随着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18],而绩效差、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会增加舞弊动因中的“需要”因子的影响,从而更有可能造成舞弊行为。相关研究还表明性别的差异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情况会产生影响,女性高管比例高的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相对较高^[14],而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抑制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19]。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 高管团队中男性比例与财务舞弊行为正相关。

H2b: 高管团队中男性比例与财务舞弊行为的严重性正相关。

(三) 高管学历

学历代表了高管的认知水平、知识积累、学习能力和理性思维。学历越高的高管在进行决策时更有可能综合考虑较多的因素、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和预测,就更有可能考虑到行为的后果,因此学历越高的高管在决策时越倾向于规避风险^[20],进行舞弊的动机也越低,发生舞弊行为的可能性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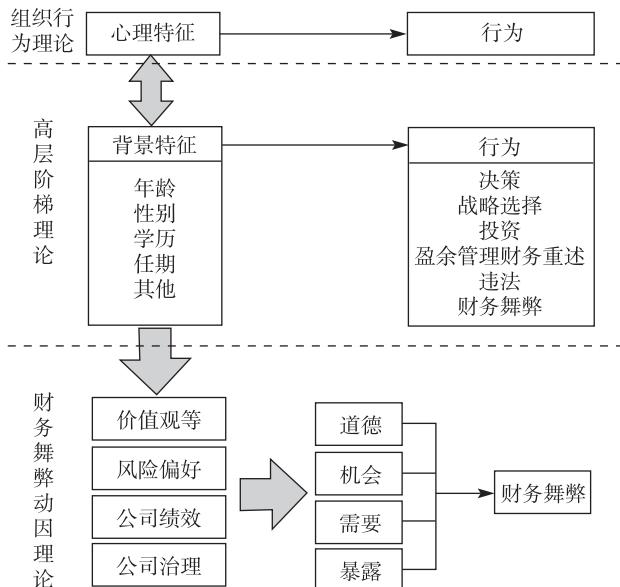


图1 高层阶梯理论与财务舞弊动因理论

低。相关研究还表明高管的学历与公司绩效相关,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越高,公司绩效越好^[21]。而根据舞弊动因理论,公司绩效和财务困境会以需要因子的方式影响财务舞弊行为,公司绩效差、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其高管就更有舞弊的需要,即需要因子的作用更大,也就更有可能发生舞弊行为。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高管团队学历与财务舞弊行为负相关。

H3b:高管团队学历与财务舞弊行为的严重性负相关。

(四)高管任期

高管的任期代表了对公司环境的熟悉程度、高管团队的磨合程度、决策过程的稳定性等。高管的任职时间越长,团队内的沟通和信息分享就越快越有效,就越能减弱对个人信息的过分依赖,避免过度自信的情况,有利于在决策时考虑更多的客观和经验因素,避免冒险行为的发生^[22-23],因此,高管任职时间能够影响风险偏好,从而影响舞弊行为。另外,高管的任职时间与公司绩效相关,高管团队的平均任职时间越长,公司绩效就越好^[24],根据舞弊动因理论,公司绩效、财务困境会增加高管进行舞弊的需要,舞弊需要是舞弊的主要动因之一,因此,公司绩效越好,高管人员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就越低。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高管团队任期与财务舞弊行为负相关。

H4b:高管团队任期与财务舞弊行为的严重性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1. 高管背景特征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

结合相关文献和我国相关规定,本文将财务舞弊定义为企业管理者为了获得不当的利益或其他目的,故意通过造假、隐瞒、粉饰等手段向外界披露不真实会计信息,可能对会计信息使用者造成损害的行为。参考以前学者的做法,本文以受到证监会处罚并公告为判定公司财务舞弊的标准。因此,本文从证监会网站公开信息中选取了我国沪深股市2001—2013年因财务舞弊受到证监会处罚的139家上市公司,剔除无法获取数据的企业后,最终确定108家公司。此外,我们根据行业和资产规模选取作为对比组的非舞弊企业样本108家。样本规模总共216家企业。

2. 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的研究

本文从上述的财务舞弊企业样本108家中选取出涉及财务数据造假的舞弊企业73家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国泰安数据库、证监会公告、上市公司年报、新浪财经网及其他网络资源。

(二)高管界定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定义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相关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界定范围。虽然不同主体对高管人员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和定义的原则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指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实际决策权,影响企业战略和绩效并对其负责的人员。结合多方的观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高管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或具有相等头衔的管理人员。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高管信息,本文将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三个职位的人员作为研究财务舞弊行为的对象。

(三)变量选取与定义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FRD*)和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LEV*)。对于财务舞弊行为的判定,本文以证监会处罚公告为准,具体包括财务数据造假、重大遗漏、隐瞒关联方关系或关联交易、虚假陈述事项等财务舞弊行为。对舞弊行为严重程度的判定,本文通过计算证监会处罚公告中财务数据造假的金额总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

2. 自变量

本文就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参考以前学者对高管团队背景特征的研究经验,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的自变量包括高管人员的年龄(*AGE*)、高管人员的性别(*GEN*)、高管人员的学历(*EDU*)、高管人员的任期(*TEN*)。

3. 控制变量

影响财务舞弊行为的因素除了高管背景特征外,还有其他的各种因素。为了提高回归分析的准确性,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控制变量的选取来减少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素。参考洪荭、何威风、姜付秀、杨清香等人的研究成果^[9,16,25-26],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每股收益(*EPS*)、资产负债率(*DEB*)、股权性质(*ATR*)、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审计意见类型(*AUD*)。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取值方法及说明
因变量	财务舞弊	<i>FRD</i>	虚拟变量,如该公司发生财务舞弊行为,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舞弊行为严重性	<i>LEV</i>	财务数据造假的金额总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高管年龄	<i>AGE</i>	该公司高管人员的平均年龄
	高管性别	<i>GEN</i>	男性高管的比例,对男性高管人员赋值为1,女性高管人员赋值为0,取其平均数
自变量	高管学历	<i>EDU</i>	该公司高管人员学历水平赋值的平均数,其中大专以下赋值为1,大专赋值为2,本科赋值为3,硕士赋值为4,博士赋值为5,博士以上赋值为6
	高管任期	<i>TEN</i>	该公司高管人员在该职位上任期的平均数,以年为单位
	公司规模	<i>SIZ</i>	该公司的总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每股收益	<i>EPS</i>	该公司的净利润除以总股数
	资产负债率	<i>DEB</i>	该公司的负债账面价值总数与资产账面价值总数之比
	股权性质	<i>ATR</i>	如该公司为国有控股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i>SHA</i>	公司当年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审计意见类型	<i>AUD</i>	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四) 回归模型设计

1. 高管背景特征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

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经验,本文对高管背景特征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建立以下 Logistic 回归模型(其中 ε 为随机误差):

$$FRD = \beta_0 + \beta_1 AGE + \beta_2 GEN + \beta_3 EDU + \beta_4 TEN + \beta_5 SIZ + \beta_6 EPS + \beta_7 DEB + \varepsilon \quad (1)$$

2. 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的研究

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经验,本文对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的研究建立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 ε 为随机误差):

$$LEV = \beta_0 + \beta_1 AGE + \beta_2 GEN + \beta_3 EDU + \beta_4 TEN + \beta_5 SIZ + \beta_6 EPS + \beta_7 DEB + \varepsilon \quad (2)$$

五、实证分析

(一) 高管背景特征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实证分析

1. 描述性分析

(1) 总体样本的统计分析

表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舞弊企业与非舞弊企业的配对检验结果。从 Panel A 可以看出,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为 45.943 岁;男性在公司高管团队中占比约为 86%;高管

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为 3.081, 约为本科水平; 高管团队的平均任职时间约为 2.76 年。这些高管背景特征数据与姚振华、何威风、姜付秀等的统计基本相似^[16,25,27]。在控制变量方面, 上市公司平均总资产自然对数达到 20.8105, 说明企业规模较大; 平均每股收益为 0.082, 说明企业的盈利状况较差; 平均资产负债率为 61.84%, 说明上市公司负债融资较多; 股权性质的均值为 0.287, 说明只有少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中央和地方政府;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35.72%, 说明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 审计意见类型的均值为 0.8287, 说明大多数公司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标准无保留意见。从 Panel B 的检验结果可知, 舞弊企业和非舞弊企业的高管

表 2 总体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Panel A: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极小值	极大值
AGE	216	45.9427	46.3333	5.0352	30	64
GEN	216	0.8612	1	0.1969	0.3333	1
EDU	216	3.0813	3	0.6757	1	4.5
TEN	216	2.7611	3	0.6423	1	6
SIZ	216	20.8105	20.7742	0.9534	17.7692	24.3991
EPS	216	0.0818	0.1580	0.6027	-3.7	1.12
DEB	216	0.6184	0.4796	0.8814	0.0126	9.4290
ATR	216	0.2870	0	0.4534	0	1
SHA	216	35.7200	31.2050	17.2853	2.88	82.07
AUD	216	0.8287	1	0.3776	0	1

Panel B: 财务舞弊企业与非财务舞弊企业高管背景特征比较分析						
变量	N	财务舞弊企业		非财务舞弊企业		T 检验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AGE	108/108	45.207	5.488	46.678	4.442	-2.318 ** (0.022)
	108					
GEN	108/108	0.899	0.191	0.823	0.196	3.100 *** (0.002)
	108					
EDU	108/108	2.998	0.719	3.164	0.622	-1.915 * (0.058)
	108					
TEN	108/108	2.661	0.636	2.861	0.635	-2.356 ** (0.20)
	108					

背景特征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有显著的差异。非舞弊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为 46.678 岁, 高于舞弊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 45.207 岁, 可以初步看出, 非舞弊企业的高管年龄组成总体高于舞弊企业, 与本文假设一致。舞弊企业的男性高管比例均值略高于非舞弊企业的男性高管比例均值, 分别为 0.899 和 0.823, 与本文假设一致。非舞弊企业的高管平均学历为 3.164, 高于舞弊企业高管的平均学历 2.998, 可以看出总体上非舞弊企业的高管学历高于舞弊企业的高管学历, 这与本文假设的情况一致。非舞弊企业的高管任期均值略高于舞弊企业的高管任期均值, 分别为 2.861 和 2.661, 与本文假设一致。

表 3 舞弊企业的舞弊手段统计表

舞弊手段	数量	占比	舞弊手段	数量	占比	
财务数据造假	利润造假	59	23.98%	隐瞒担保或其他重大事项	77	31.30%
	银行存款造假	11	4.47%	其他	23	9.35%
	固定资产造假	6	2.44%	虚假陈述股权关系	9	3.66%
	借款造假	6	2.44%	舞弊	10	4.07%
	应收账款造假	5	2.03%	隐瞒关联方资金往来	8	3.25%
	货币资金造假	3	1.22%	隐瞒关联关系	8	3.25%
	应付账款造假	3	1.22%	手段	6	2.44%
	在建工程造假	3	1.22%	虚假陈述事项	4	1.63%
	存货造假	2	0.81%	隐瞒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短期投资造假	1	0.41%	隐瞒资金占用		
	无形资产造假	1	0.41%			
	预付账款造假	1	0.41%			
	合计	101	41.06%	合计	145	58.94%
	总计	246	100%			

(2) 舞弊企业舞弊手段的统计

为了解舞弊企业的财务舞弊行为, 本文对舞弊手段进行统计如表 3 所示。在表 3 的统计中, 以舞弊行为的种类为计量单位, 例如某一企业同时进行利润造假和隐瞒关联交易的舞弊行为, 则记为进行了两种舞弊行为。

从表3可以看出,企业进行财务舞弊的手段花样繁多,其中财务数据造假比例为41.06%,比较高。而在财务数据造假方面又主要以利润造假为主,占到23.98%,上市公司在经营状况不佳,尤其是发生亏损,甚至连续亏损面临退市危险的时候,就有可能通过虚增利润的手段进行舞弊,以达到减少亏损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目的。此外,上市公司为了获得新融资、提升股票在证券市场的吸引力或其他各种目的,也有可能通过虚增利润进行舞弊。在其他舞弊手段中主要以隐瞒担保或其他重大事项为主,占比为31.30%。舞弊企业中涉及重大数额担保未按规定披露的情况非常多,这与我国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特殊的金融信贷现状相关,往往是为关联企业进行的贷款担保。

2. 相关性分析

为了了解本文研究的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模型中涉及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通过表4可以看出,高管年龄AGE、高管学历EDU与高管任期TEN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FRD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高管性别GEN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控制变量方面,公司的资产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但都不显著;公司的每股收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审计意见类型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司的产权性质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也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以上的相关状况与本文的假设基本一致。同时,通过表4也可以看出各个自变量之间只存在较弱的相关关系,说明各个自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表4 Pearson相关系数表

	FRD	AGE	GEN	EDU	TEN	SIZ	EPS	DEB	ATR	SHA	AUD
FRD	1										
AGE	-0.146 **	1									
GEN	0.193 ***	-0.117 *	1								
EDU	-0.123 *	-0.285 ***	0.185 ***	1							
TEN	-0.156 **	0.163 **	-0.078	-0.005	1						
SIZ	0.0003	0.066	-0.04	0.101	.217 ***	1					
EPS	-0.231 ***	0.053	-0.211 ***	0.098	0.156 **	0.236 ***	1				
DEB	0.071	-0.043	0.071	-0.008	-0.089	-0.238 ***	-.440 ***	1			
ATR	-0.041	-0.033	0.023	0.171 **	-0.07	-0.147 **	0.079	-0.094	1		
SHA	-0.313 ***	0.047	0.055	0.041	-0.024	0.130 *	0.062	-0.097	-0.011	1	
AUD	-0.233 ***	0.044	-0.029	0.03	0.048	0.101	0.285 ***	-0.256 ***	0.098	0.170 **	1

注:***、**、* 分别表示在0.01、0.05、0.1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3. 多元回归分析

我们利用模型(1)对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更好地考察高管背景特征对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我们先分别将高管团队年龄、性别、学历、任期各个变量单独放入模型,最后将所有自变量放在同一模型中进行回归(见表5)。

表5的列(1)显示,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越大,越不容易发生财务舞弊,验证了H1a。表5的列(2)显示,高管团队中的男性比例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高管团队中男性比例越高,越容易发生财务舞弊行为,验证了H2a。表5的列(3)显示,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越高,越不容易发生财务舞弊,验证了H3a。表5的列(4)显示,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时间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时间越长,越不容易发生财务舞弊,验证了H4a。表5的列(5)是将所有自变量加入模型后的回归结果,高管背景特征对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基本与前面回归一致。

为检验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背景特征对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差异,本文依据样本中上市公司的股权性质,划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两组样本,并分别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在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的平均学历水平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不论是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高管团队的学历在不同的水平下均会显著影响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另外,在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都不显著,这表明不论是国有控股还是非国有控股,高管

变量	表5 多元回归分析				
	(1)	(2)	(3)	(4)	(5)
AGE	-0.060 *				-0.074 **
	0.055				0.033
GEN		2.113 ***			2.676 ***
		0.0098			0.003
EDU			-0.416 *		-0.821 ***
			0.084		0.005
TEN				-0.652 ***	-0.553 *
				0.022	0.061
SIZ	0.258	0.240	0.273	0.308 *	0.439 **
	0.134	0.156	0.111	0.078	0.018
DEB	-0.203	-0.192	-0.176	-0.207	-0.141
	0.330	0.379	0.409	0.351	0.513
EPS	-1.176 ***	-0.976 **	-1.216 ***	-1.097 ***	-0.780 *
	0.005	0.017	0.005	0.009	0.059
ATR	-0.077	-0.099	0.057	-0.137	0.093
	0.821	0.773	0.869	0.692	0.802
SHA	-0.041 ***	-0.043 ***	-0.041 ***	-0.044 ***	-0.049 ***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AUD	-0.989 **	-1.076 **	-1.046 **	-0.962 **	-1.123 **
	0.034	0.022	0.026	0.038	0.019
常量	-0.029	-4.116	-1.803	-1.953	-1.158
	0.994	0.255	0.609	0.583	0.770
R 平方	0.258	0.274	0.254	0.268	0.351

注:***、**、* 分别表示在 0.01、0.05、0.1 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团队的任期时间都不会显著影响财务舞弊行为的发生。从表6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非国有企业高管的年龄和性别都对财务舞弊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国有企业高管的年龄和性别对财务舞弊行为都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非国有企业的内部竞争激烈,高管年龄越大,处事越稳重,越不敢冒险进行舞弊,而高管团队中男性比例越高,越容易做出过度自信的行为,越可能进行舞弊;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国有股直接控制了进入董事会的人选,从而间接控制了总经理的人选,没能建立起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28],使得内部环境相对稳定,从而不存在与非国企类似的情况^[25]。

(二)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的实证分析

该部分选取108个舞弊企业样本中涉及财务数据造假的73个舞弊企业,以舞弊行为的严重性LEV为因变量,以高管年龄AGE、高管性别GEN、高管学历EDU、高管任期TEN为自变量,对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的关系进行分析。由于表3已经对样本做出了详尽的描述,故该部分不再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

1. 相关性分析

表6 股权性质分组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总样本	子样本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AGE	-0.074 **	-0.0870 **	-0.0593
	0.033	0.0430	0.3686
GEN	2.676 ***	2.7954 ***	2.2131
	0.003	0.0093	0.2469
EDU	-0.821 ***	-0.7294 **	-1.3062 *
	0.005	0.0303	0.0536
TEN	-0.553 *	-0.3332	-0.6631
	0.061	0.4123	0.1888
SIZ	0.439 **	0.4314 **	0.6645
	0.018	0.0447	0.1238
DEB	-0.141	-0.2132	1.6664
	0.513	0.3921	0.2647
EPS	-0.780 *	-1.2978 **	0.4940
	0.059	0.0286	0.5195
SHA	-0.049 ***	-0.0475 ***	-0.0520 **
	<0.0001	0.0002	0.0113
AUD	-1.123 **	-1.1225 *	-1.1131
	0.019	0.0539	0.2541
常量	-1.158	-1.3081	-5.0648
	0.770	0.7722	0.5857
R 平方	0.351	0.370	0.378

注:***、**、* 分别表示在 0.01、0.05、0.1 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为了解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况,本文对各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系数的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Pearson 相关系数表

	<i>LEV</i>	<i>AGE</i>	<i>GEN</i>	<i>EDU</i>	<i>TEN</i>	<i>SIZ</i>	<i>EPS</i>	<i>DEB</i>	<i>ATR</i>	<i>SHA</i>	<i>AUD</i>
<i>LEV</i>	1										
<i>AGE</i>	-0.166	1									
<i>GEN</i>	0.185	-0.128	1								
<i>EDU</i>	-0.352 ***	-0.200 *	0.101	1							
<i>TEN</i>	-0.254 **	0.191	-0.194 *	-0.049	1						
<i>SIZ</i>	-0.234 **	0.166	0.032	0.131	0.043	1					
<i>EPS</i>	0.036	0.042	-0.209 *	0.028	0.00008	0.024	1				
<i>DEB</i>	0.547 ***	-0.112	0.213 *	-0.222	-0.191	-0.106	-0.066	1			
<i>ATR</i>	-0.121	0.029	0.029	0.168	0.09	0.015	-0.015	-0.094	1		
<i>SHA</i>	0.241 **	0.114	-0.12	-0.067	-0.024	-0.046	0.108	0.041	-0.061	1	
<i>AUD</i>	-0.102	-0.201 *	0.109	0.236 **	0.022	0.021	-0.108	0.039	0.132	-0.031	1

注:***、**、* 分别表示在 0.01、0.05、0.1 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表 7 可以看出,舞弊行为严重性 *LEV* 与高管学历 *EDU* 和高管任期 *TEN*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假设的方向一致;舞弊行为严重性 *LEV* 与高管年龄 *AGE* 存在负相关,与高管性别 *GEN* 存在正相关,也与假设的方向一致,但其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此外,各个自变量之间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不高,说明各个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2. 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 SPSS 对高管年龄、高管性别、高管学历、高管任期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的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8 所示。

通过表 8 可以看出,在总样本回归分析中,四个变量只有高管学历在 5% 水平上显著,其系数为 -0.442,这表明高管学历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负相关,与假设一致。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高管学历越高,所知的法律知识越多,法律敏感性越高,越不敢冒风险舞弊,即便进行舞弊,也会考虑到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而进行轻微的舞弊。其他三个自变量中,高管年龄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负相关,高管性别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正相关,高管任期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负相关,相关方向与假设一致,但是均不显著。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所选取的关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的指标不具有代表性,或者是因为对相关的控制变量的考虑不够全面。

在分组样本回归分析中,国有企业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只有高管学历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显著负相关。非国有企业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不一致,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团队的性别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显著正相关,平均任期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显著负相关。产生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非国企中高管团队男性比例越高,越容易做出过度自信的行为,故而越容易进行严重的财务舞弊行为;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非国企中内部竞争比较激烈,任期不确定性更强,所以任期越长,高管的风

表 8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总样本	子样本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i>AGE</i>	-0.034	-0.011	-0.008
	0.116	0.656	0.845
<i>GEN</i>	0.770	1.365 **	0.044
	0.169	0.046	0.960
<i>EDU</i>	-0.442 **	-0.272	-1.293 ***
	0.011	0.156	0.004
<i>TEN</i>	-0.184	-0.410 **	-0.040
	0.210	0.024	0.856
<i>SIZ</i>	-0.152	-0.306 *	0.0760
	0.211	0.050	0.650
<i>EPS</i>	0.285	0.928	0.232
	0.426	0.129	0.579
<i>DEB</i>	1.235 ***	1.491 ***	0.678
	0.0001	<0.0001	0.321
<i>SHA</i>	0.001 **	0.020 ***	-0.007
	0.020	0.005	0.507
<i>AUD</i>	0.013	-0.057	-0.365
	0.402	0.837	0.478
常量	-0.212 **	6.785 **	3.758
	0.036	0.035	0.338
R 平方	0.408	0.655	0.581

注:***、**、* 分别表示在 0.01、0.05、0.1 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险承受能力越弱,考虑到被发现的风险和相应的法律后果,越不敢进行严重的财务舞弊行为。

(三)稳健性测试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如下两方面的稳健性检验:(1)参考洪荭等的研究^[25],由于我国从2005年开始实行股权分置改革,本文剔除2005年之前的观察值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2)参考何威风等的研究^[16],将文中相关变量按两端各1%的标准进行了缩尾处理后进行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1年至2013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财务舞弊企业和对比组的非舞弊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背景特征与是否发生财务舞弊行为的关系以及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严重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高管人员的年龄与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负相关;男性高管的比例与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正相关;高管人员的学历与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负相关,与财务舞弊行为的严重性负相关。研究证实了部分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舞弊行为之间的关系,说明了高管人员的背景特征确实对财务舞弊行为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从产生财务舞弊行为的内部因素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对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另外,本文对财务舞弊行为的研究中,不仅考虑了舞弊行为是否发生,还考虑了舞弊行为的严重程度,增加了分析结果的参考意义。本文还结合高层阶梯理论和财务舞弊动因理论,分析了高管背景特征如何通过影响行为和舞弊动因因子的方式影响财务舞弊行为的,可以加深对两方面理论的理解。

上述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不仅有助于我们从高管团队的背景特征方面来识别财务舞弊行为,还有助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建设,从而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具体表现在:第一,关注高管团队的年龄构成,避免形成过于年轻化的高管团队;第二,重视女性高管的作用,适当提高女性高管人员比例;第三,注重高管团队学历水平的提升;第四,加强上市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建立积极、正面、诚信、道德的企业文化,以实现环境对人的正面影响。本文的研究局限性在于:对高管背景特征的研究限于背景特征数据的平均值,没有涉及高管团队中背景特征的差异性,在对高管背景特征的相关研究中,加入对团队差异性的考虑,能够提供另一个视角。

参考文献:

- [1] 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93-206.
- [2] Albrecht W S, Romney M B, Cherrington D J, et al. Red-flagging management fraud: a validation[J]. Advances in Accounting, 1986, 3: 323-333.
- [3] Kinney W R, McDaniel L S. Characteristics of firms correcting previously reported quarterly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9, 11(1): 71-93.
- [4] Cottrell D M, Albrecht W S. Recognizing the symptoms of employee fraud[J]. Healthcare Financial Management: Journal of the Healthcare Financial Management Association, 1994, 48(5): 18-22, 24-5.
- [5] 陈庆杰,余春宏. 财务报告舞弊的高管因素分析与人本治理[J]. 财政研究,2006(1):61-63.
- [6] Klein 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oard of directors' composition,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degree of CEO domination ov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R]. Working Paper, 1999.
- [7] 韦琳,徐立文,刘佳.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基于三角形理论的实证研究[J]. 审计研究,2011(2):98-106.
- [8] 陈国欣,吕占甲,何峰. 财务报告舞弊识别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J]. 审计研究,2007(3):88-93.
- [9] 杨清香,俞麟,陈娜. 董事会特征与财务舞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2009(7):64-70+96.
- [10] 吴革,叶陈刚. 财务报告舞弊的特征指标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审计研究,2008(6):34-41.

- [11] 岳殿民, 韩传模, 吴晓丹, Chao - Hsien Chu. 中国上市公司会计舞弊方式实证研究[J]. 审计研究, 2009(5):82 - 89.
- [12] 李若山, 金彧昉, 邱新娥. 对当前我国企业舞弊问题的实证调查[J]. 审计研究, 2002(2):17 - 22.
- [13] 杨微, 姚涛. 公司治理与财务舞弊的关系——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5):24 - 30.
- [14] 杨星.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有效性[J]. 商业会计, 2013(12):82 - 84.
- [15] 王霞, 薛跃, 于学强. CFO 的背景特征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中国财务重述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财经研究, 2011(9):123 - 133.
- [16] 何威风, 刘启亮.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与财务重述行为研究[J]. 管理世界, 2010(7):144 - 155.
- [17] Peng W Q, Wei K C J. Women executive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the S&P 1500[C] Financial Management Annual Conference, 2007.
- [18] 任颋, 王峰. 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0(5):81 - 91.
- [19] 章铁生, 林钟高, 秦娜. 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能否抑制财务舞弊的发生? [J]. 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11(4):39 - 45.
- [20] Flood P C, Fong C M, Smith K G, et al. Top management teams and pioneering: a resource - based view[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97, 8(3): 291 - 306.
- [21] 林新奇, 蒋瑞. 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3):190 - 197.
- [22] Finkelstein S, Hambrick D C. Top - management - team tenure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484 - 503.
- [23] Fraser S, Greene F J. The effects of experience on entrepreneurial optimism and uncertainty[J]. Economica, 2006, 73(290): 169 - 192.
- [24] 孙海法, 姚振华, 严茂胜. 高管团队人口统计特征对纺织和信息技术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J]. 南开管理评论, 2006(6):61 - 67.
- [25] 洪荭, 胡华夏, 郭春飞. 基于 GONE 理论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识别研究[J]. 会计研究, 2012(8):84 - 90 + 97.
- [26] 姜付秀, 伊志宏, 苏飞, 黄磊. 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 管理世界, 2009(1):130 - 139.
- [27] 姚振华, 郭忠金.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组织绩效: 基于国企、民企和欧美外企的对比[J]. 学术研究, 2012(5):83 - 90 + 159.
- [28] 秦江萍, 段兴民. 中外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动机比较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5(4):50 - 54.

[责任编辑:高 婷]

Top Managers' Characteristics and Financial Fraud Behavior :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LU Xin, LI Huimin, CHEN Shuohui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d fraud motivation theory, this paper uses empirical metho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rs' characteristics and financial fraud behavior. The samples of this research are public companies that are punished by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 financial fraud and the control group. From the result we can see that age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on fraud behavior; scale of male top managers also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on fraud behavior; and even education level h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on fraud behavior.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given based on above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top management team's characteristics; financial fraud; fraud motivation; management fraud; enterprise strategy; corporate financial strategy; financial fraud behavior; accounting fraud